

湖北省第二次屈原学术讨论会综述

湖北省第二次屈原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日至八日在武昌举行,全省以及来自上海、天津、辽宁、新疆、湖南、广东等地的一百三十多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屈原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近五十篇。

这次会议重点针对“屈原否定论”展开了讨论。早在二十年代起,我国学者廖季平、胡适、何天行、卫聚贤等,先后在《楚辞讲义》、《读楚辞》、《楚辞新考》、《〈离骚〉底作者》等著述中,曾提出过怀疑或否定屈原及其作品的问题;五十年代,也曾有个别学者持此观点。在当时,就遭到众多学者的有力反驳,以后便逐渐消声匿迹了。近年来,日本学界的少数汉学家,承袭廖季平等人的观点,再次提出“屈原否定论”。其代表著述有三泽玲尔先生的《屈原问题考辨》、铃木修次先生等合编的《中国文学史》和稻畑耕一郎先生的《屈原否定论系谱》。“否定论”的基本观点:一是否定屈原的存在,认为屈原“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主人公”,“想象中的作家”,是汉代贾谊或刘向虚构出来的人物;二是否定《离骚》等作品是屈原的著作,或认为是秦代作品,分别出自秦始皇和秦博士之手,或认为是汉代作品,为刘安等人所作,或认为《离骚》是“经过古代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讨论会上,大家本着事实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原则,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从不同角度对“否定论”予以全面反驳。如有的运用考古发掘的楚文化资料,论证屈赋产生的艺术背景及历史客观性,认为大量的出土文物向我们证明,战国时的楚国,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艺术,都“取得了人们意想不到的辉煌成就”,与屈赋相印证,“是那样协调,那样吻合,那样一致”,说明屈赋“完全应当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产物”,“不然,在一个灿烂辉煌的艺术世界里,如果诗歌倒寂然无声、默默无闻,那就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了”,从而驳诘否定论者认为屈赋不可能产生于战国楚地,而只能产生于汉代的曲说。有的以现存的史料,印证屈赋中关于战国楚地婚俗的描述,从民俗学的角度论证屈赋产生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认为战国楚地的婚俗,与中原婚俗有明显的不同,从屈赋中关于婚俗

的描述来看,它只能是战国楚地的产物,从而驳诘否定论者认为屈赋出自战国后北方中原作家之手的伪说。有的对楚辞的流传与楚辞学的发展情况,以及刘向编集《楚辞》的依据、目的和背景作了具体考察,认为屈原及其作品,早在西汉初年就已流传民间,从汉武帝开始,屈赋便受到统治者的垂青而进入宫廷,刘向编集《楚辞》是完全可信的,从而驳诘否定论者所认为的《楚辞》“非刘向所集”,甚至说成是刘向之子刘歆“伪造的古书”,“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屈原的传说,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等臆说。有的以古代训诂为依据,驳诘否定论者对《离骚》某些字词的误解,以及据此而提出的种种谬说,如“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独以为尊称”,“古者君臣之间通称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独称之”,“父曰皇考,母曰皇妣”,“皇”字也不能只作“三皇”之“皇”解,而否定论者却因为《离骚》中自称曰朕、称父曰皇考而认定为秦始皇的自序,显然是片面武断之辞。有的从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特点出发,驳诘否定论者对屈赋创造的意境及形象所作的种种曲解,如借用神话和传说,以抒发现实的情感,本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而否定论者却把《离骚》塑造的上下求索的诗人“自我”形象,说成是“游荡于幽明之际的精灵”,以美人喻圣君贤臣,本是起自《诗经》的传统比兴手法,而否定论者却把《离骚》中以美人喻君,或以美人、弃妇自比,说成是“使用无视男女性别的比喻”,在当时以至汉初,“定会成为一种受蔑视的对象”,显然都是无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特点的臆断之辞。有的则着重指出否定论者混淆概念、以小论大、以部分否定全体、循环论证、以疑证疑等思考问题和论证问题的方法性错误,如从屈原的事迹现存先秦典籍无载而推断先秦时的典籍无载,由此得出屈原是不存在的错误结论;先假定贾谊《吊屈原赋》为西汉末年人伪托,而推出“屈原投水而死的传说,在武帝时还没发生”,又据此推断“《吊屈原赋》产生的时代,必不在西汉时代”;《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尚有争议,否定论者都据以推断《离骚》作于西汉时代,等等。总之,通过讨论,大家都为匡正

曲说,光大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感到由衷畅快。

当然,在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国内和国际学者共同努力去探求解决。在学术讨论中,不同意见的发表本是正常的现象,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但不能无视客观实际“标新立异”想当然。因此,讨论会上大家在确认屈原及其作品的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就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一、关于屈原的主要史料《史记·屈原列传》。个别学者坚持其以往的观点,认为《屈原列传》疏误颇多,不足为据。绝大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持此观点的同志未免吹毛求疵,夸大其辞,以今律古,不切实际地苛求古人,并引证大量史料,参证屈原的作品,证明《屈原列传》所载的屈原的基本事迹是可信的,当然也不否认《屈原列传》同时存在某些文义不属、前后矛盾、记叙欠详明之处。大家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错简,后人的删补、窜改,秦火汉乱所造成的史料不足等,我们不能见疑废史,据此全盘推翻《屈原列传》和否定屈原的存在,而只能依据不断发现的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修正、补充和整理的意见。

二、关于屈原放逐的时、地。屈原一生究竟放逐过几次,什么时间,地点在哪里,向有争议。从这次讨论会提交的几篇有关论文来看,比较一致地认为屈原在楚怀王时期只被疏远、免职,其被放逐是在顷襄王时期。只是有的认为在顷襄王元年至三年,先放流汉北,后迁于江南。有的认为顷襄王六年,屈原因数谏不从,触怒于王,曾请自疏居郢,作《离骚》,复招怨遭迁,于十年左右涉江至辰、溆,十八年又归郢参与国事,二十一年秦拔郢,顷襄王东迁陈,屈原获罪遭弃逐,再次入湘。有的认为可能在顷襄王六年至十四年之间,地点是先汉北,而后于十九年至二十一年,由汉北至郢都,抵陵阳,再迁江南。

三、关于屈原的思想。讨论会上,大家继续申论了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民族渊源和历史特点,还突出强调了屈原的改革精神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此外,还探讨了屈原的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有的认为屈原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有的则认为属于稷下唯物派的精气说一类,大致属于道家。

四、关于《离骚》与《九歌》。因历来论者甚多,故大家都试图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以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如有的结合中国民族审美的心理特点,论述《离骚》三段式、三面式(回旋式,对比式,流动式)、三线式(心理线索,音乐线索,文字形式线索)的独特结构艺术;有的从时、空、人关系的角度,论述《离骚》中诗人“自我”形象的崇高美;有的论述《九歌》的情理结构,认为它以主体性原则为出发点,以避免顶点的情节为活动基石,对内扩展为刻画诗中人的内心世界,对外辐射为人化的自然,由此形成以叙事为抒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整体特征,它的出现,为中国抒情诗开辟出一块大天地,即把本来属于叙事诗的题材也纳入抒情诗的领域,从而在扩大表现艺术地盘和阻碍再现艺术的产生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九歌》主旨这一为古今众多学者多方探索的旧题,有的论者也能不囿于旧说,从具体分析作品所提供的艺术形象入手,参证屈原的其他作品,确认“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是其即事抒情的总特征,力排忽视其祭歌的特点,认为篇篇有寓意的寄兴说,与完全排除其中渗透了诗人的内心情感的纯粹祭神巫歌、民歌、人神恋爱说。也有论者以新证申论以往学者提出过的《国殇》不属《九歌》说。

五、关于屈原的浪漫主义。有的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探讨屈原与神话、《庄子》浪漫主义的异同;有的则就其本身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屈原的浪漫主义,具体表现出“奇美”和“险怪”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并寻绎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演化轨迹。

(书海)